

赣南客家文化与中央苏区革命建设的互动与形塑

颜悦

南昌职业大学, 中国·江西 南昌 330007

摘要: 本文深入探讨 1927 年至 1934 年间, 赣南客家文化与中央苏区革命建设之间的复杂互动与相互形塑过程。通过整合湘赣边区土客社会变迁、苏维埃运动及其财政问题, 以及客家地方社会研究的成果, 分析了客家独特的社会结构、经济生活、族群认同和文化信仰以及如何影响中国共产党在赣南地区的革命策略与实践。同时, 本文考察中央苏区如何通过土地改革、社会动员、文化改造和财政建设等手段, 改造并反向形塑了客家社会。客家地区作为边缘地带的固有复杂性与脆弱性, 为革命的渗透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而革命的成功亦离不开对客家社会深层矛盾的有效利用与改造, 最终促成赣南客家文化与中央苏区建设的融合。

关键词: 赣南客家; 中央苏区; 苏维埃革命; 土客关系; 地方社会; 文化形塑

The interaction and shaping of Hakka culture in southern Gannan and the revolutionary construct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 Region

Yan Yue

Nancha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China Jiangxi Nanchang 330007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in depth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and mutual shaping process between Hakka culture in southern Gannan and the revolutionary construct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 Region from 1927 to 1934. By integrating the changes in the Hakka society, the Soviet movement and its financial problems in the Hunan and Jiangxi border areas, as well as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on Hakka local socie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unique social structure, economic life, ethnic identity and cultural beliefs of the Hakka people, and how they influenced the revolutionary 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southern Jiangxi.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Hakka society was transformed and reversely shaped in the Central Soviet District through land reform, social mobilizatio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financial construction. The inherent complexity and fragility of the Hakka region as a marginal area provid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penet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 The success of the revolution is also inseparable from the effective u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ep contradictions in Hakka society, which ultimately contributed to the integration of Hakka culture in southern Ganna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Keywords: Hakka in southern Gansu; Central Soviet District; The Soviet Revolution; Turkish-guest relations; Local communities; Cultural shaping

0 引言

20 世纪上半叶, 中国社会经历着剧烈而深刻的变革, 其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 年)构成了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关键篇章。以赣南为核心的中央苏区, 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权建设、军事斗争和社会改造的实践场域, 更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然而, 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之下, 构成革命基础的区域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往往容易被简化或忽视。赣南地区, 作为中国重要的客家聚居区之一, 其独特的客家文化、复杂的族群关系以及脆弱的经济结构, 无疑深刻地影响了苏维埃革命的发生、发展与结局。该地区长期存在的移民

(客家多属此类)与土著之间围绕土地、资源和权力展开的冲突, 是其社会变迁的核心驱动力之一^[1]。

本文旨在以赣南客家文化为核心, 深入探讨其与中央苏区革命建设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文章将分析客家文化的哪些特质使其成为革命的潜在力量, 同时, 革命政权又如何利用、改造甚至冲击了这些特质, 从而形塑了一个在革命熔炉中走向“中心”地位的客家社会。

1 赣南客家社会的基础性特征: 革命的内生土壤

客家人, 因其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迁徙, 在抵达赣南等边缘山区后, 与当地土著居民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

新来的移民群体,在迁徙地往往面临土地资源稀缺、社会地位较低以及与原住民在文化习俗和经济利益上冲突不断的困境^[1]。赣南客家同样多聚居于山区或丘陵地带,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耕地稀少,生计维艰,形成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质,这构成革命在此生根发芽的内生土壤。

1.1 边缘性与脆弱的经济基础: 贫困与变革的吁求

客家聚居区多位于边远山区,交通不便,耕地资源有限,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低于富庶的平原地区。赣南地区有限耕地资源加剧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客家农民沦为佃农或无地农民。这种长期经济压力,使客家社会内部贫富分化日益加剧,普通民众生活困苦,对改变现状的渴望尤为强烈。当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时,贫苦客家农民是天然的响应者。他们对土地的极度渴望,成为土地革命最直接、最广泛的驱动力,也使得革命更容易在这些经济边缘地带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

1.2 强大的宗族组织与族群认同: 动员与凝聚的潜能

客家宗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一定的排外性,是客家人在陌生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以及与土著竞争的基本单位。宗族内部成员在共同利益和外部压力下能够迅速团结起来^[1]。宗族纽带日常维系社会秩序、教育功能,但面对外部压力,也可能转化为群体性的反抗力量。客家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它不仅是经济生活的组织者,也是社会秩序和文化遗产的载体^[2]。革命初期,中共在乡村发动群众,尝试利用和改造传统的宗族组织。宗族部分开明分子或贫苦宗亲被吸纳进革命队伍,利用其在族内的影响力,通过打破宗族权威,发动贫苦农民反抗宗族内部的剥削。客家人的族群认同,在面对土著或其他外部压迫时,使得他们更容易形成统一战线,这种集体行动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转化为了革命动员的优势,有助于迅速建立起革命基层组织。

1.3 “硬颈”精神与反抗传统: 坚韧与斗争的品格塑造

客家人素有“硬颈”(不屈不挠、刚强)之称,这源于其多次迁徙和在边缘地带与艰苦环境斗争的历史。这种精神在面对不公和压迫时,往往会转化为激烈而持久的斗争。谢宏维笔下的“棚乱”以及土客之间的长期纷争,都体现了这种不畏强权的特质,即使面对官府的镇压,棚民也能长期坚持斗争^[1]。当中国共产党宣传阶级压迫、呼吁工农翻身时,这种内在的反抗冲动与革命的号召不谋而合,客家民众更容易被唤醒和组织起来,成为红军战士的坚实

来源。他们的坚韧和牺牲精神,构成了中央苏区能够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重要内在支撑。

1.4 地理区位与国家控制的薄弱: 革命的“庇护所”功能

赣南山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长期以来是国家政权控制的薄弱地带。边缘地区保留着更多传统习俗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运作模式,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和控制力难以深入到乡村末梢。国民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军事控制力难以有效渗透这些边远山区,使得中共可以利用这个权力真空,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治理体系,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发展壮大。客家地区的这种边缘性,反而成为了革命力量的“庇护所”和发展壮大的空间。

2 中央苏区建设与对客家社会的改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并非简单地利用客家社会的固有特质,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造运动。苏维埃政权在乡村社会层面的改造实践,这些实践在客家地区表现出独特的强度和复杂性。

2.1 土地革命: 旧秩序的根本性颠覆

土地革命是苏维埃运动的核心内容,对客家社会产生了颠覆性影响。赣南客家地区,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土地革命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积极响应。客家宗族内部也存在着佃农与地主(或富裕族人)的矛盾,土地革命通过划定阶级成分,有意打破了宗族内部的团结,将主要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将宗族内部的贫困客家人推向革命阵营。革命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客家农民,极大地满足了他们对土地的渴望,从而获得了最为广泛、最为直接的群众基础。

2.2 阶级重构与社会动员: 传统权威的瓦解

苏维埃政权通过严格的阶级划分,将传统客家社会中的地主、富农、士绅等旧有精英打倒,取而代之的是贫苦工农。这不仅是一场经济上的重新分配,更是一场权力上的根本性转移。革命政权通过贫农团、工会、农会等组织,将最底层的客家民众动员起来,使他们参与到批斗地主、管理政权、参军参战的过程中^[3]。这种自下而上的动员,在客家地区尤为有效,因为它不仅满足了经济需求,也赋予了长期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客家人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感和身份认同感。通过改造传统的宗族组织,削弱宗族对个人和家庭的控制,强调对革命的忠诚,苏维埃政权逐步建立起一套基于阶级认同的新型社会组织体系,从而有效瓦解了宗法血缘对社会的束缚。

2.3 文化改造：移风易俗与意识形态的灌输

中央苏区建设对客家社会的影响，不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文化和精神层面。苏区在婚姻、教育、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改造实践。革命提倡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对客家传统父权制和宗法制度的权威构成冲击此外，兴办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传播革命思想，使得客家地区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苏维埃政权破除迷信、禁赌禁娼，力图清除旧社会遗留的陋习，建立革命的新道德、新风尚。这些文化改造措施，挑战了客家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但也为客家民众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促使他们逐渐从传统宗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接受现代化的启蒙。

2.4 财政与经济建设：革命命脉的维系

革命根据地的财政问题是维系政权运行和战争胜利的命脉。在客家地区，土地税是主要的财政来源，其征收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持续性。例如，苏区政府对土地税的征收通常根据土地肥瘠和产量进行区分，以体现公平原则。然而，长期战争和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使得苏区财政异常紧张。这种紧张导致了群众负担的加重，如“扩红”困难、公债摊派、粮食征集等，使得革命的“限界”逐渐显现^[9]。尽管如此，苏维埃政权通过建立银行、发行货币、发展贸易合作社等方式，努力维持苏区的经济运转，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客家地区长期以来的经济困境，也促进了区域内部的经济流通。然而，这种财政压力亦反过来对客家民众的革命热情构成了严峻考验。

3 革命形塑下的客家社会新面貌

经过中央苏区革命的洗礼，赣南客家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且多维度的变化。

3.1 社会结构的根本性重构：阶级关系的重塑

革命最直接的影响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性重构。地主阶级被消灭，传统的宗族权威被削弱，贫苦工农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新的政治精英（工农干部）取代旧的社会精英（地主士绅）时，详细阐述了这一过程。它无疑打破了长期以来束缚客家社会的旧有阶层壁垒，为社会流动打开了通道。大量客家青年积极参军参政，成为新政权的骨干力量，实现了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宗族作为社会基层组织的统治地位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党支部、乡苏维埃政府、贫农团等新的组织形态，社会重心从血缘转向了阶级。

3.2 族群认同的复杂演变：从土客到阶级认同

在革命的大熔炉中，传统的土客族群认同在一定程度

上被“阶级认同”所取代。革命要求所有阶级兄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虽然族群间的历史隔阂难以完全消除，在共同的革命目标和阶级斗争中，部分土客矛盾被暂时压制或转化，促进了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客家人在革命中的积极参与和贡献，使得其在全国视野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从相对边缘的群体走向了历史的中心。革命的实践使客家人获得了全新的身份认同——“革命群众”或“红军战士”，这种身份认同超越了地域和族群界限，构建了新的共同体意识。

3.3 经济模式的初步探索：集体化与计划化的萌芽

土地革命虽然解决了土地分配问题，但苏区经济面临的挑战巨大。尽管有封锁和战争的严峻形势，苏区依然在发展农业生产、兴办小型工业、开展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艰苦的探索，例如组织劳动互助社、成立消费合作社等。这些尝试，为客家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也锻炼了客家人民在极端困难下组织生产、克服困难的能力。虽然这些探索具有战时经济的特点和局限性，但它们蕴含了集体化和计划化的初步萌芽，对客家地区乃至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3.4 集体记忆与精神传统的塑造：革命的深刻烙印

中央苏区的革命历史，成为了赣南客家地区重要的集体记忆。红军的英雄事迹、根据地的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根植于客家民众的意识中。苏维埃运动塑造了深刻的革命文化和集体记忆，这些记忆在后续历史进程中不断被重构和强化。这种革命记忆不仅塑造了地方的历史叙事，也成为客家精神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原有的“硬颈”精神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地域文化标识。此后，客家地区也因其作为革命根据地的特殊贡献，获得了国家层面的重要关注和扶持。

4 结语

赣南客家文化与中央苏区革命建设关联性是一场复杂的双向互动与相互形塑的过程。客家地区作为边缘地带，其固有的经济脆弱性、强大的宗族凝聚力、“硬颈”的反抗精神以及相对薄弱的国家控制，共同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渗透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边缘地区所蕴含的社会矛盾和组织潜力，恰好与革命的需求相契合。革命政权通过土地革命、阶级重构、文化改造和经济建设，深刻地改变了客家社会的旧有秩序和生活面貌，将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贫苦客家民众推向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同时，客家文化并非被动地接受改造，它以其独特的宗族网络、族群认同、坚韧精神和地方习俗，反作用于革

命的进程,影响着革命策略的调整、运动的深度和广度,乃至最终的成败。土客矛盾在革命中的利用与转化,客家“硬颈”精神对红军战斗力的贡献以及对“左”倾激进行为的潜在影响,都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强大生命力。革命的实践证明,任何一项宏大的社会变革,都必须与具体的地域文化和社会结构相结合,才能生根发芽并获得成功。

参考文献:

[1] 谢宏维. 斯土斯民: 湘赣边区移民、土著与区域社会变迁 (1600—1949)[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20.

[2] 劳格文[美], 谭伟伦. 中国客家地方社会研究 (四).

粤东粤北社会.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45.

[3] 黄道炫. 权力、经济与社会: 湘赣边区苏维埃运动的个案研究 (1927—1934)[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55.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南昌职业大学红色文化研究课题,《赣南客家文化与中央苏区革命建设关联性分析》(课题编号 2024NH15)。

作者简介: 颜悦 (1997—), 女, 汉族, 湖南株洲人, 硕士研究生, 助教。研究方向: 红色文化、生命伦理、科技伦理。